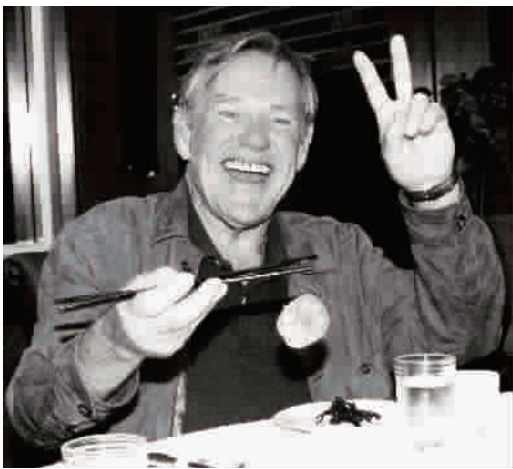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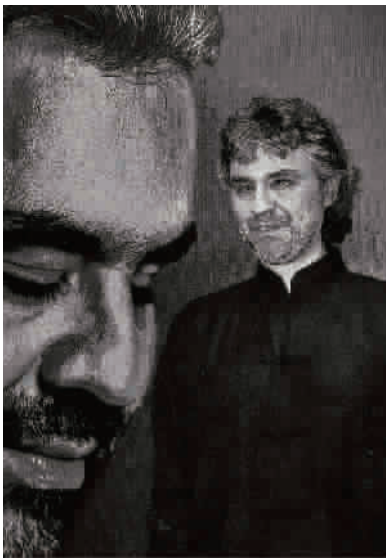
■ 一次与苏菲玛索去古镇游览,在一家餐馆,她看到墙上挂了上海民国美女老相片,便坐下来欣赏。我随即按下快门,留下来这个画面。现实中的法国的大美女在欣赏墙上的中国美女,很有情趣的画面。



■ 这是艾里森·杨,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的老瑞恩的演员,他应黄蜀芹导演邀请来上海拍电影,中午一起上城隍庙吃小吃,席间他用筷子挟糖藕,夹起来让我拍照,我在取景框里见他得意样子,感觉已成功了。结果我回家冲印照片,发现糖藕在空中定格,这个画面可遇而不可求,让我再拍一百遍也难成就这画面。这是上帝施与的最佳瞬间。



■ 世界男高音之王帕瓦罗蒂来上海,在演唱会结束后的酒会上,上海首席男高音魏松请帕瓦罗蒂在乐谱上签字,帕瓦罗蒂一口答应,签字后也提了条件,要魏松开嗓唱一首歌,魏松没有准备,有些紧张,帕瓦罗蒂就帮着魏松提拿话筒,这真是天大的待遇,我想世界上大概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享受这般“服务”。这就是我期待的画面,重要的人物在重要的场景做了意外的有意思的行为。我想,真正的大师都不需摆谱装范,有足够能量的艺术家都是和蔼,亲切,尊重同行的。



■ 安德烈·波切利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小时候特别喜欢唱歌,12岁意外失明,音乐成为他感知世界、叙抒情感的唯一方式。2004年他献演上海大舞台,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安德烈·波切利特意穿着唐装,在新闻发布会上让记者拍照,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突然把眼睛睁开,对于一个盲人,这是非常偶然的情景。快门随即记录了这非常偶然的情景,摄影的快乐就是取自意外的精彩瞬间。



■ 帕尔曼是我最钦佩的以色列小提琴家,12岁的时候就在美国卡耐基演奏小提琴独奏,他曾经与卡拉扬合作。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旋律主要是帕尔曼的一把小提琴在演奏。2002年上海音乐学院邀请他来开国际大师班,学员来自全世界。开学仪式前,我特别提早了半小时到现场,惊喜地发现帕尔曼也来了。作为大师班的导师,他没有拿小提琴,而是拿着摄像机在大厅里捕捉学员走进来的画面,而且他是坐在轮椅上进行的。这个大反串让我非常感动,我希望能够拍好他。为了体现他在我心目中的高大,我蹲下来,用低视角仰拍,把帕尔曼突出画面,也把摄影机突现出来。摄影是一种特殊的造型语言,摄影者必须先有想法,然后根据在想法中选择角度、把握瞬间。



■ 我见到的马友友非常幽默,在大剧院小舞台,他看见我就迎面做了一连串的鬼脸,我来不及按快门。心想今天会有戏,要拍鲜活的。后来他在台上为上音学生讲课,感觉轻松幽默,边教边做鬼脸,丝毫没有大师的矜持,非常生活化。他要求学生理解:大提琴演奏的不是乐曲,而是情感。他让学生演奏,他来感受,曲后他说我感受到了哭泣,并做了个哭泣的动作,我抢拍了这一瞬间。

捕捉艺术家的真我瞬间

◆ 管文明 / 摄

影像杂叙

我对纪实摄影有一种由衷的热爱,觉得是在用感性的视觉语言叙说一段历史过往,巧妙地抓拍真实画面所呈现出的冲击力是别的方式无可比拟的,每一次不同的立足点和捕捉视角都带给我一番全新的观察体验,艺术性的思考让我镜头前的真实场景有了故事性,在纪实的过程中有了情感的生发,让我在个体感受与现实场景的融汇中体会到二度创造的无尽新奇,于是便有了这十年间的形象记忆。

在上海迎世博会期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世界艺术家在上海》一书,书一出版就去了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许多朋友惊奇问我,怎么能拍到这么多世界文化名人,

我说:第一,运气好,处在了一个外国艺术家争相来上海献艺的时代,而我正好处在能够接近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第二我对艺术有非一般的兴趣,是兴趣让我沉迷在自己的工作中。1988年,我在《上海文化年鉴》编辑部担任摄影记者,后来到广播电视报继续本行。整整25年,都在用照相机为上海这座城市做文化艺术的影像记录,工作中有机会拍摄到很多世界顶级文化名人。我为上海有这些艺术家的到来感到骄傲,也为能欣赏世界艺术家的风采感到幸运。

照相机和绘画不一样,只要按一下快门,就把这个瞬间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照片就有了历史的价值。因此我按快门有一个铁的纪律,就是“真实”,取景时只讲究角度和瞬间的选择,而绝不干预被摄对象,让他们尽可能忘却照相机的存在,而通过我的静观神会捕捉艺术家们自然流露的真我瞬间,以我的内心视像定格一些独具韵味的小细节。我常常把镜头当作隐秘于人像背后的目光,镜头前真性情的人影和镜头后我真实的内心交织起了光影构图和体态神情,让视觉有了温度和态度。这些一念之间的吉光片羽让艺术家们的形象穿越时空渐次清晰,让彼时的情绪气息得以传递到此时,让旧事人影沉淀出一番风景,有意思的偶得瞬间由此转化成了有意义的历史时刻,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一般讲,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家到来,我有四次拍摄机会,一是他们来了机场接机,二是他们要开新闻发布会,三是他们有演出,四是他们最后的酒会或是旅游。由于10年在《上海文化年鉴》工作,对重要的文化事件较敏感,后来在广播电视报工作,在第一线采访,那时上海的对外文化交流正处于高峰期。拍摄世界艺术家的机会较多,因此我记录了大量国际著名艺术家的影像。